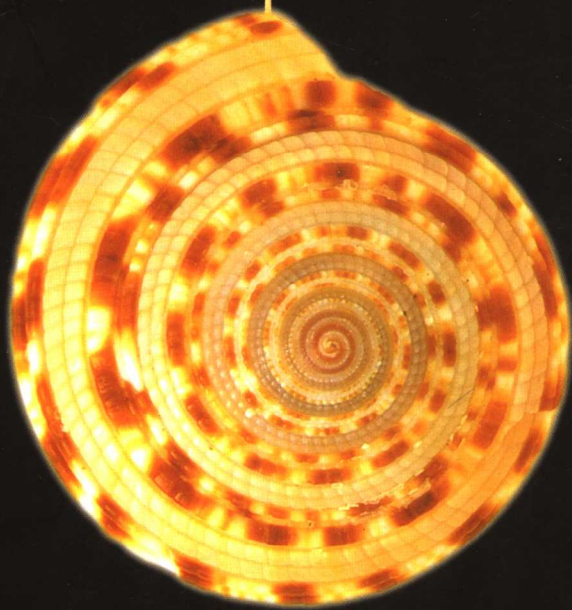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10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學苑出版社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 10**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第10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左东岭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9
ISBN 7-80060-343-1

I. 文… II. ①首…②左…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735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周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尺寸:965×1270 1/16

印 张:24.5

字 数:382千字

版 次: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24.00元

思想性 / 学术性 / 前沿性

《文学前沿》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钱中文 袁行霈

委员：

王一川	王元骧	王先霈	王岳川
王逢振	叶嘉莹	朱立元	吴元迈
吴中杰	吴思敬	李炳海	林毓生
周策纵	杨 义	张 炯	张燕瑾
陈 炎	陈伯海	陆贵山	罗 钢
罗宗强	金元浦	项 楚	胡经之
饶芃子	段启明	费振刚	赵宪章
赵敏俐	徐公持	盛 宁	黄天骥
郭志刚	曹顺庆	曾繁仁	童庆炳
蒋述卓	董乃斌	葛晓音	

《文学前沿》编辑部

主 编：左东岭

副 主 编：邓小军 吴相洲 陶东风 邱运华（常务）

责任编辑：汪龙麟 陶礼天 魏家川

目 录

·文化研究·文艺美学·

- [美]本·卡林顿著 王佳译 中心的解构: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3)
- [美]E. 迪安·科尔巴斯著, 阎景娟、贺玉高译 当前的经典论争(30)
- 李兆前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概念透视(62)
- 王 彬 从解构走向整合: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时空嬗变(73)
- 周 蓉 李 艺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视知觉心理学探析(84)
- 杨 光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小议(94)
- 胡疆锋 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流行歌曲歌词中的青年形象阐释(101)
- 何云波 跨文化视野中的跨学科研究(117)
- 周秀萍 昂贝多·艾柯与“过度诠释”问题(125)
- 王志耕 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的演进(132)
- 赵炎秋 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146)
- 周茂丽 城市美感的时空特性研究(164)
- 朱国华 电影:文学的终结者?(170)
- 盖 光 文艺生态自然审美的生成性特征(185)
- 赵连元 审美与恶俗(200)

·诗歌·戏曲研究·

- 吴 晟 联章: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言说体式(211)
- 舒大清 谣本义考及与歌、风谣关系辨析(230)
- 马银琴 论“二南”音乐的社会性质与《诗经》“二南”的时代(246)
- 许红英 陶渊明《停云》、《时运》、《荣木》拟束皙《补亡诗》辩(258)
- 孙良申 谢灵运与政治(263)
- 陈丽芳 顾瑛《玉山璞稿》研究(269)
- 张作祥 自然美要旨说略——解读钱塘潮(276)

- 杨柏岭 浑化理念的门径追寻
——周济的宋四家门径论(282)
- 张宝石 解诗用诗辨(294)
- 刘涵之 穆旦诗歌精神论(307)
- 黄季鸿 《西厢记》语言风格论剖析(330)
- 杨 坤 从《风流梦》改本看冯梦龙之戏曲改编(340)
- 张金尧 运用生态思维观照戏曲现状(348)
- 访谈与笔谈·
- 李润霞 中国新诗史写作的问题与方法(361)
- 李世涛 戴阿宝 记忆中的美学往事:访聂振斌先生(373)

·文化研究·
·文学美学·

中心的解构: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

本·卡林顿 著
王 佳 译

对于文化研究的论述有许多种;它有许多种不同的历史。它是一整个系列的信息;在过去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危机和重要性。它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我坚持强调这一点!它通常是一组不稳定的构成。只有在标明引用时它才被“中心化”……

——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合法性》

简介

我居住在英格兰的布赖顿码头,近来我漫步于那里新开的多层的柏德书店和咖啡馆,询问销售助理在哪里能够找到社会学的书籍。“社会学?”她显然因为我询问这样一个陈旧的科目而感到困惑,回答说,“或许是在文化研究的下面?”我试图从她的话语中找到后现代的讽刺的迹象,但是失败了;“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之下”。

她的评论促使我思考当下英国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稍显狂乱的关系。它给我以启示,似乎文化研究取得了与相近的同源学科相比较而言的统治性的地位——我很想说是“霸主地位”。的确,即使把文化研究自身看作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言说模式、边界、历史的分立的学科,它还是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尽管这个主张中包含着固有的矛盾本质。更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应当被更精确地解读为一种鲜明的跨学科的研究计划,相对于学院概念的界定、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它的贡献更多表现在促进了现有的政治批评的形成。

在英格兰,有多少学生学习文化研究和相关的学科——传

媒研究、电影研究、运动与休闲研究,等等,就有多少学生选“正统”的社会学课。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的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课程,它们表面上是一些社会学系用以缓和相应的一批热切渴望向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而不是罗伯特·弥尔顿(Robert Merton)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学习的学生开设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显然很郁闷,并且与时代错位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成了又酷又迷人的科目。此外,当下文化研究的制度化还要求批评的反应。

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经谈到,想要把握现代主题的全部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被不可胜数的文化现象所包围,无论对他来说(原文如此)这些现象到底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总体来讲,这些现象对他是个打击,因为他没有能力完全吸收它们,也不能简单地拒绝它们,因为毕竟它们潜在地属于他的延伸的文化范围之内。”(1968:44)。在任何一家大书店的文化研究类书籍前驻足,都确实很容易认同西美尔的那种被压倒的感觉。所以,现在有许多作品正在宽泛的“文化研究”的门类之下被生产出来,这就很难去强调当代的趋向,或者记录下在文字生产的浪潮中,哪些是名副其实的新鲜有趣的事物。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非试图标识出文化研究在英国的所有详细情况,我所强调的议题也不是唯一需要引起关注的,相反,我会指出一些关键的议题,对它们要引起格外的重视,这要比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在思考的关于文化研究为当下的社会分析提供了些什么这一问题更加值得引起格外的关注。我尤其质疑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的单线描述,这给予自由闲散的学院式的历史以特权,并引发了一些关于文化研究在当下的大学制度化的忧虑。与对文化研究的官方历史的质疑相关联,我认为批评自身的匮乏也是个问题。鉴于文化研究内部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呈现,在最后,我考察了一些当下的文化研究的个案,由此引发疑问:文化研究是否已经通过一些易于使人想到的途径,就像那位销售助理一样,至少通过含蓄地暗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

从霍加特到霍尔

现在有某种接近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的官方的历史,已被认为是对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的叙述。对于任何曾读过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概要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它都不会显得陌生。一般说来,它表述如下:

文化研究的开始是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写作的《文学的作用》(*The Use of Literacy*),以及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写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为标志的。有时也会提到E.P. 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但这种提法不常见,因为这部书相当长,很少有那个当代的研究者有时间和耐心真正去细致地阅读全书。接着,在介绍了学者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他们会讲到霍加特为彭古因·布克斯(Penguin Books)出席法庭之事,即为D.H. 劳伦斯(D.H. Lawrence)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辩护,反对判其有伤风化。接下来的故事是,赢得官司之后,彭古因捐赠了一笔钱给霍加特,霍加特随之用这笔钱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一个文化研究中心,后来由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接管”(这时霍加特在故事中退场了),霍尔成了中心的主任,他和一些年轻聪明的学生一起读了许多法国的社会学理论和葛兰西(Gramsci)的著作。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受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的评论文章的启发,排除了那种拙劣的马克思者所持的生产主义的优先权,寻求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流行文化作用于人的,以及文学的对抗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其余的部分,按照那些文章中一贯的说法,是历史。

我并不想否认以上所述的确发生过——但是很明显,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个人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同样地,某些习俗成了各种特别的智力活动的焦点。关于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确有很多有益的介绍,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带着关切之心来讲述它的故事(见斯多瑞1996;特纳1996;穆赫恩2000)。我的意图并非要将一个新的看法加诸现在这个已经自述得很好的寓言,而是希望通过以下的描述,能够引发一些关于这些疏忽的思考。

官方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的叙述,其问题之一是,他们倾向于将学院式的文本的出版,强调成“生产”文化研究,认为它是大学内学院式的纪律倡导的结果,而不是把这些文本本身看作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社会改革与建立能让成年人和工人都接受教育的学校为目标的教育的社会政治进程这一广阔背景之下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事实上会使很多学生和讲师不再试图理解有关文化研究的广泛的社会信息和

文化研究的目的。因此,尽管有很多人赞同霍尔的观点,尝试去发现文化研究那吸引人的但却是虚假的开端,并且认为“最初的理性思想是及其稀罕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延续和突破”(霍尔 1980:16),文化研究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在追溯它的开端,他们常常将之确定在 1957 年左右。

对于大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年轻的白人大学生来说(这样说是因为在 30 年中,虽然英国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能上大学的人数也并没有增长),文化研究差不多就是一种用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来解构文化文本的方法。然而,在 60 年前,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们试图去理解在社会中,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所包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他们从事的事情与另外一个课题密切相关。假如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谈及文化研究的话,则对于他们来说,“文化研究”最初是和成年工人的教育情况相关的。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社会的希望,使得许多大学里的导师将工人的教育状况和对日常生活的分析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一些人想要鼓励一种直露地社会主义的、划分阶级的、其形式是以工人的教育为目标的学说,与更加自由的和更为普遍的成年人教育相对,它的基本的目标是确立一种模式,由教师为那些没有接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们提供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尽管这种乌托邦的想像从未完全得到实践,但它展现出了文化研究出现的来龙去脉。正如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简明阐述的那样,“在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诞生了文化研究这只不死鸟”(1997:9)。

记住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关键不在于记住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写了哪些书,而是要注意到,他们都是处在正规的高等教育部门的边缘或者在此范围之外参与了这场政治进程的成人教育工作者。在一段时间里,斯图尔特·霍尔也曾教授过大学的校外课程,而且他职业生涯中的许多时间都用于教授公立大学的成年学生,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公立大学,他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和那些没有特殊背景的学生进行交流,这就可以继续文化研究的教育实践的价值观。(见《犹太人智慧的信息》,收在莫利 & 陈 1996)。文化研究首要的是一门政治学科,它的目标是使工人阶级中的成年人都能接受教育。重申这一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斯蒂尔 1997:15)。一种紧张关系始终存在着,而且随着提供成人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和公共机构上都被包括进“中产阶级”大学系所。总之,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成年人和工人人们的

教育的独立空间,以及政治实践转变为以大学为基础的教学的纪律的逻辑,这一转变会导致我们今天对文化研究的起源、文化研究是什么,以及它可能的发展的理解变得狭窄,正如威廉斯本人着重指出的:

在我们现在对文化研究的理解的意义上,几乎无法更强烈地强调它……关于成人教育:在工人教育协会,在校外课程的扩大班。有时候我阅读一些关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的材料,其中极具特点地追溯了文本中的文化研究多姿多彩的发展情况。我们都知道那些关于文化研究的叙述,它们由旧至新排列为《文学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文化与社会》等等。但是,事实上,在40年代晚期,甚至在30年代,文化研究就已经在成人的教育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活跃了。由这些后来的书中,只能使人们对印刷字体熟悉起来,获得某种一般性的知识上的认知。我常常对许多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却在当时没有发表作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与我们做一样多的工作、来创建这门学科的人感到悲哀。(威廉斯 1989:154)

我并不是要宣称这是一种全新的或原初的见解。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人在不同的文本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例如,见顿 1986,莱恩 1986,戴维斯 1995,以及德沃克 1997)它是作为帮助记忆文化研究形成的一个方面的状貌的另一种选择被提供出来的,这种做法极具被集体的记忆驱逐出去的危险,由此导致很成问题的后果:我们如何看待与文化研究同时代的相关事物。当一个像克里斯·贝克尔(Chris Barker)那样机敏的注释者能够宣称,文化研究的“主要场所现今通常是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书店之时”(2000:7,补充强调),那么,在他的描述中包含着一种见解,使得他将文化研究的真实意图(和当下的定位)描述成一个非政治化的人文学科。

由此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的是,尽管指称“英国文化研究”可能是一种实用的速记方式,这样可以强调一些普遍的关联,即把社会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情况联系起来理解文化研究的地位和重要性,然而这样做又将产生一种效果,它暗示了一种错误的统一与结合,而这事实上并不存在。当然,(广义上定义的)文化研究工作在英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国家意义上的定位——已经展开,但这和宣称一个英国文化研究的

传统的存在可不是一回事,尽管有些人所作的概括在这样暗示。关于成年的工人的教育的研究工作强调,由威廉斯开创的更格式化、更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干涉主义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工作和对女性主义的分析的重要贡献,90 年代关于英国黑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研究,在后现代主义者影响下的“新民族志”研究由许多“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开创,还有其他的研究中心,例如开放大学,东部伦敦大学,或戈德史密斯学院,都可以宣称在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将他们描述成“英国文化研究”的构成部分,似乎他们的研究工作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论是相同的,差别只是年代和场所的不同罢了,这就把意义延伸得太远了。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对这种原初的国家主义者的想像的质疑。

质疑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英国”

无论人们会对于赞成早期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大众文化中,通过他们的思考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的做法说些什么,文化研究在这一转变时期所充当的教育者的角色这一无可争议的要点仍然是被忽略的。女权主义的学者们尤其清晰地以事实证明了,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工作中,有多少研究表现出一种由男性制定标准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总是无法在严肃的意义上将焦点集中在对性别身份、性、完全理论化的父权制的建构的思考上(见布鲁德森 1996;富兰克林以及其他 1991;格雷 1997;麦克罗比 1994,2000;纳瓦 1992)。的确,很多人主张负责工人教育问题的社团或联盟应该把教授的知识结构重点集中在分析更重要的“公共焦点”,例如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经济;这样做是有事实根据的:“软性的”规则与人文学科的结合将会使工人的革命事业变得软弱无力,这暴露了某种男权主义者和男性家长的设想(对照斯蒂尔 1997)。

然而,我想要通过强调一些方法来简要地讨论另一个“遗漏”。有些主张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保护了“真实”的工人阶级交往免于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它们产生于特殊的国家种族化形式之中。早期的许多重要研究极少将焦点集中在以下方面:种族的形成如何作为中心与英国的国家主义这一焦点相关联,或是一个充满疑问的事实:他们总是在讲到一个独特的英格兰时非常敏感,而在提到大不列颠时却并非如此。这个理论上的疏

忽给一些想要追溯某些知识分子的世系血统、以便从其早年的活动中发掘出一些征兆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简单地忽略了当代文化研究中作为核心主题的“种族”和种族化。

在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及稍后一些时间里,英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变迁,这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语境。因为文化研究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尝试,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曾经是世界“超级大国”的英国衰落了(霍尔1980;1992)。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文化研究同样影响深远。尤其是在英国重建社会基础设施时,由于严重的生产力短缺,英国从它先前的殖民地招聘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另外也招聘护士和医生,由此而来的移民来自亚洲、非洲,特别是来自讲英语的西印度群岛,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特性、内容以及风格的重塑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索罗默斯2000)。与其说现在如此之多的“种族”渗透到英国的灵魂中——它总还在塑造着这个都市的习俗、传统和模式——不如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即使英国的殖民地关系可能被认为是发生在“英国之外”,现在,透过这些浪潮,英国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其帝国主义的合法性的实质——“岛国种族”看上去不再那么不合逻辑。

即使官方政府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是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时,亚洲人和黑人走在大街上仍会遭遇到英国人的暴力和敌意的对待。这种情形在70年代尤为严重。当时人们目睹了国内经济的低迷和波及更广的全球经济衰退,受英国的基础制造业的迅速衰退以及失业率急速上升的刺激,英籍亚洲人和黑人的政治地位突然变成了“内部敌人”,据称是他们占去了本土英国人的工作。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也发生了一场政治动荡。它是由战后时期为了帮助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 Thatcher)领导的“新右派”政府选举成功的团体主义政策引起的。该政府将一种“自由市场”的经济方法与一种更直露的国家独立主义的政治形式相结合。现在“种族”一词已经与移民联系起来,成为重要的政治焦点之一,概括地说,它为这个国家的每个郡都蒙上了忧虑不安的色彩——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它还带来政体的危机。

穆特(Munt)指出,“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对于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研究最终的联合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他是正确的,那么,这就很令人奇怪了:50年代期间及此后,工人阶级的本质被重新塑造,由于新“种族”路线它发生了断裂化,它被调停,被别的势力

拉帮结盟,在文化研究内部被拙劣地理论化了。这种情形直到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人们认为文化研究在50年代就存在,它始终执着于工人阶级的命运。然而当英国被社会政治的大漩涡紧紧掌控时,文化研究未能理解这些变化并作出充分的反应,它将任何纯粹地从阶级关系出发的对文化结构的变化分析都看作是对文化研究的宗旨的否定。(对照奥乌苏 2000)

尽管有迪克·海蒂兹(Deck Hebdige)早期的重要作品和公认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1978)《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这些里程碑式的著作,与它们相对,还有个例外也特别重要,那就是1982年出版的《帝国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有些人把它看作当代文化研究中最重要介入之一。(索罗穆斯 & 巴克 1996:270;霍尔 1996:270)。这本书试图解释在英国资本主义陷入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的社会斗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将“种族”拿来把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并加以“处理”,特别是在这里,无论这场运动如何助长“种族”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它们还是受到了抵制。正如霍尔回想到的,“让文化研究采用自己的工作日程,种族这个重要的问题、种族政治、对种族主义的抵制、文化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本身就是一项深刻的理论斗争……只有当一种漫长的、毫无疑问有时是非常痛苦的斗争——反对一种后果惊人但又不易察觉的平静的斗争结束的时候,它才真正地完成了”(1996:270)。在论述《帝国反击》出版的背后知识分子进行研究工作的背景时,霍尔继续谈到,“保罗·吉尔罗什和一群撰稿人发现想要在研究中心开创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必要的理论与政治空间是及其困难的”(出处同上)。

通过重新确立文化的重要性,对工人阶级的抵抗形式加以重新阐释和认可,在其中确立超阶级的凝聚力和知识分子的地位,这给予早期文化研究的工作以莫大的支持。这种观点是来自于葛兰西的一些著述和他的“民族-民众”(national-popular)概念(福加克斯 1988;1999)。很明显地,当“民族-民众”容许一个空间的存在,在其中对国家运作和政治策略之间关系的批评将得到发展,这也意味着国家本身通常是被当作设定的事物看待的。霍尔认为,吉尔罗什的介入标志着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是要撇开他欣然将“国家”作为政治斗争的场所:

国家—大众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也有些令人担忧之处。它[……]将我们引入一场奇怪的争论中,在那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边缘:你可以创造一个英国的国家—大众概念,这个想法与任何地域无涉。这是一个艰难时刻。我们只有从一个事实中才能得到拯救:我刚从伯明翰中心的圈子里跳出来,保罗·吉尔罗什却一头扎进去了。如果你沿着这条路线走得太远,认为享有特权的政治实体一定是国家,——国家—大众,而不是大众——那么你就钻进死胡同啦(1997a:29)。

某些描述独一无二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赞扬之辞”常常重复的恰恰是这个问题。确切地说,他们未能重视相互间的文化和跨国的思想交流,而这对于促进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进步大有裨益;另外,他们还忽视了更广阔的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怎样首先为阶级划分的政治形式的出现创造条件的。这大概就是 C.R. 詹姆斯(C.R. James)在他的象征物和作品中接受了许多本可忽略不计的关于历史的讨论的原因所在。

保罗·吉尔罗什本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通过与人合著《帝国》一书加入文化研究中心,后来他花费了职业生涯中的许多时间,试图在这方面准确地突破渐趋狭隘的凝视概念,因此他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又显得有些矛盾(见史密斯 1999)。在这一语境中,最重要的文化研究书籍之一是吉尔罗什(1987)的《联邦邦境内没有“禁止黑人”》(*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Fack*)。书中混杂了社会理论、基础的经验分析、历史的敏感性、与革新的以交往为基础的政治的结合,以及原创性的思想,这些都使得它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文本。事实上,在那样一个潮流中,很多人会频频引用这本书,尽管很难辨识那些宣称读过这本书的人是否都注意到了它的论证中所包含的暗示。吉尔罗什在他的教授讲演中详细地将他的事业描述为正在被他的“当面对现存的帝国主义的挑战时,对所有形式的国家主义的憎恶,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的行为应该是道德的、正义的这一责任的担忧”所整合(1999:184)。对于吉尔罗什来说,“种族”的问题也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帝国一样,对于英国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表面的影响。这些进程是理解英国的经济是怎样构筑的,它的阶级关系是如何得到调停的,以及随后它们是如何对其文化和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施以更普遍的影响的这一系列问题